



房宁◎著

China's Experience on Democracy

民主的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s Experience on Democracy

民主的中国经验

房宁◎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中国经验 / 房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617 - 1

I. ①民… II. ①房…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34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lib.cnu.edu.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从中国经验出发	(1)
第一章 历史的起点与探索	(13)
一 民主的历史起点问题	(13)
(一) 世界史视角:英美法近现代政治的起点	(14)
(二) 历史的输入:中国近现代政治的起点	(17)
二 探索救亡图存之路	(20)
(一) 洋务运动:政治精英的自强运动	(21)
(二) 戊戌变法:文化精英的变法改革	(26)
(三) 义和团运动:“草根”救亡运动	(30)
(四)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新道路	(34)
三 民主政治与社会结构改造	(39)
(一)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宪政体制革命	(39)
(二) 改造传统社会结构是民主建设的基础	(40)
第二章 基本国情与民主政治	(43)
一 政治制度的物质基础	(43)
(一) 基本国情对政治制度的制约	(44)
(二) 雅典:小国寡民的民主制度	(46)
(三) 法国:六角形国土上的二元政体	(48)
二 基本国情线:“瓯珲一腾冲线”	(53)
(一) 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	(53)

2 民主的中国经验

(二)人口分布反映的自然条件	(55)
(三)资源分布失衡	(58)
(四)资源的跨区域调配	(59)
三 中国国情对政治制度的约束与要求	(61)
(一)两河文明孕育古代政治制度	(61)
(二)统一与发展:国情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	(64)

第三章 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70)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70)
(一)建党前后的民主理论	(70)
(二)中央苏区的民主实践	(72)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74)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76)
二 新中国建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	(78)
(一)制定第一部《宪法》	(78)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建立	(81)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建立	(83)
(四)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86)
三 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	(88)
(一)拨乱反正,规划政治体制改革蓝图	(88)
(二)80年代初的四大改革	(90)
(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98)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形成	(107)
(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提出与论述	(107)
(二)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08)
(三)发展协商民主	(114)
(四)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116)
(五)发展基层群众自治	(117)

第四章 保障权利与集中权力的统一	(120)
一 民主政治发展的策略选择	(120)
(一) 实践之惑:“民主”还是“集中”	(121)
(二) 反思“文化大革命”:“民主”与“法制”的平衡	(127)
(三) “西单墙”:体制外因素兴起	(127)
(四) “戈尔巴乔夫热”:苏联改革的影响	(131)
(五) “十三大”:“党政分开”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132)
二 认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	(136)
(一) “八九风波”的冲击	(136)
(二) 风波后反思:将“四项基本原则”植入“改革开放”	(137)
(三)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40)
三 “保障权利”与“集中权力”的逻辑与功能	(144)
(一) 党与人民两面一体:“三统一”的政治语义	(144)
(二) 保障权利:调动社会积极性	(147)
(三) 集中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	(151)
第五章 重点发展协商民主	(163)
一 中国协商民主的由来与发展	(163)
(一) “三三制”与“旧政协”	(164)
(二) 新政协开启协商民主实践	(165)
(三) “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	(167)
(四) 新时期协商民主的新发展与制度化	(167)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形态与特色	(169)
(一) 协商民主的当代价值	(170)
(二) 协商民主的主要形态	(173)
(三) 协商民主的主要特色	(174)
三 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基础	(175)
(一) 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的直接来源	(175)
(二) 协商民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176)

4 民主的中国经验

(三) 协商民主融入市场经济元素	(177)
四 国际视野中的协商民主	(178)
(一) 协商民主在西方	(178)
(二) 中西协商民主的异同	(180)
第六章 循序渐进发展人民权利	(184)
一 渐进权利观的理论合理性	(184)
(一) 权利是历史的而非天赋的	(184)
(二) 权利来自社会而非个人	(186)
(三) 权利是现实的而非理想的	(188)
二 渐进权利观的实践合理性	(189)
(一) 权利的非线性发展	(189)
(二) 欧美国家政治发展史的经验	(190)
(三) 后发国家盲目民主化的教训	(192)
三 坚持走渐进式权利发展之路	(193)
(一) 把握权利意识的两面性	(194)
(二) 坚持科学的权利发展观	(195)
(三) 逐步实现和扩大人民权利	(196)
第七章 问题推动与试点推进	(199)
一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问题	(199)
(一)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199)
(二) 政治问题的特殊性	(202)
(三) “顶层设计”的前提与条件	(204)
二 问题推动的路径选择	(206)
(一) 现象大于本质:从治标入手	(206)
(二) 积小胜为大胜:降低改革成本	(211)
三 试点推进的程序原则	(211)
(一) 认识论:寻求主客观统一	(212)

(二) 试错法:分散改革风险	(212)
(三) 公推直选:改革试点案例分析	(213)
第八章 民主经验的国际比较	(219)
一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分析与比较	(221)
(一) 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四个时间概念	(221)
(二) 竞争性选举是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形式	(222)
(三) 竞争性选举的三种局限性	(225)
(四) 西方竞争性选举对中国的启示	(234)
二 亚洲政治发展参照	(239)
(一) 亚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240)
(二) 东亚模式的体制功能	(242)
三 苏联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	(244)
(一) 苏联的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	(244)
(二)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	(250)
(三) 苏联改革的失误与教训	(251)
第九章 中国民主建设的策略与展望	(257)
一 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制度供给因素	(258)
(一) 权力制约的需要	(258)
(二) 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	(263)
(三) 反腐倡廉的需要	(267)
二 推进民主建设的三项基本策略	(270)
(一) 分层次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270)
(二) 扩展协商民主范围,提高协商民主质量	(272)
(三) 建立权力制衡体系,发展民主监督	(274)
三 中国民主发展展望	(277)
(一) 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稳定问题	(278)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问题	(282)

6 民主的中国经验

(三) 中国选举民主的未来	(286)
结语 提炼中国的民主话语	(294)
一 民主三要素论	(295)
二 历史定义论	(298)
三 民主主题论	(300)
四 民主阶段论	(302)
参考文献	(305)

绪 论

从中国经验出发

民主政治是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民主政治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探索和建立适应时代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发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将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但是，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缺乏民主政治实践和经验的国家。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在探索中建设，在建设中发展和完善。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十分重要，总结自身经验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源泉。只有及时地正确地总结经验，才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健康发展。了解和研究民主政治发展的国际经验和相关理论也是必要的。国外的历史与经验，可以为总结中国的民主实践经验和进一步提炼中国民主理论提供比较和参照。

一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历史环境、现实国情，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起点和基础；而满足当代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则是推动和塑造当代中国民主的决定性因素。

从表面上看，民主似乎是一种“普世价值”，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采取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类似的，都被称为民主政治。但是，实际上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历史原因是有差别的，

2 民主的中国经验

民主政治在各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从近代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英国的历史情况看，英国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权利保护成为英国民主的起点和重点。法国民主政治起源于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出现在下层阶级反抗上层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因此，长期以来争取自由成为法国式民主的主题与鲜明特色。美国民主诞生于反抗外来压迫的独立战争，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特殊原因，美国独立建国时较之欧洲国家有较大的制度选择和建构空间，使得许多源于欧洲的民主观念与政治原则在新大陆上的实践表现胜于旧大陆。美国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即实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双重开放，这是历史赐予美国的礼物。后世各国的民主政治鲜有建立之初即实行权利与权力的双开放，这也主要是后世诸国难有美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路不同。导致各国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原因是具体的，是有差别的。开端包含目的性，历史起点不同，历史任务不同，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道路。中国民主政治的起点是由于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在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产生了民主政治的诉求，出现了最初的民主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后，寻求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富强的新国家，成为新的历史任务。民主政治成为调动人民建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政治机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也由此从救亡图存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历史起点和历史主题的输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道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却没有发生变化。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一条反映中国人口、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经济地理分界线“瑗珲—腾冲线”，近80年过去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旧貌换新颜，但是“瑗珲—腾冲线”却依然没有消失。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有四项资源居世界前列：人力资源、市场资源、水能资源、煤炭资源。人力与市场资源不论，我国的水能资源高居世界第一，煤炭

资源产量第一、储量第三。中国拥有的居世界前列的四大资源呈现为对称的颠倒分布状态，绝大部分的人口和市场资源在“瑗珲—腾冲线”以东，而绝大部分水能和煤炭资源居于“瑗珲—腾冲线”以西。大规模调配资源因此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重要特质，而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无论具体形态如何，都必然要适应这一基本国情。中国现代政治体制必须具备大规模调配资源，有效治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巨大国家的能力。

民主政治是人们的选择，但选择不是任意的，人们只能在历史任务和国情条件等客观因素设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深刻地决定和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求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必须能够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又能够集中民力和民智，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有效调配资源、有利于保卫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来说，只有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这两方面的基本需求，才是一个可供选择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是一个真正为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制度，因而也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制度。

二

中国的民主有与其他国家的民主相通的地方，也有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的民主，是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奋斗和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对当代中国民主有着深刻影响。在长期和反复的探索中，中国民主建设取得了自己的重要经验。民主的中国经验，在与其他国家民主进行比较的意义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民主的特点。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思考与比较，民主的中国经验中有四条尤为重要和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

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最早可以溯源到 1215 年英国的《大宪章》。《大宪章》是西方近现代民主的起源，《大宪章》的核心内容是权利保障，当年是通过设置法律和机构以保障贵族的权利。《大宪章》开辟的政治实践经数百年的演化，发展为现代西方的宪政体制和议会民主。保障权利的价值在于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并进一步形成经济活动预期，从而激励民众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从 18 世纪欧美工业化时代，到日本 19 世纪的明治维新，再到 20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人类工业化时代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共同验证了，保障人民权利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自由，权利的开放和保障，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资源禀赋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由于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产生的巨大社会推动力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中国大地上不可胜数的从无到有、脱颖而出、卓尔不群的成功故事，就是以权利开放为取向的政治改革的最有说服力的注脚。

然而，权利保障还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的一个方面。如果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中都包含着权利保障的因素而并不为中国所独有，那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则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最具特色之处。中国是后发国家，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民族。因此，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仅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还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梦”不是田园牧歌，而是一个伟大民族立于世界之巅的雄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中国要后来居上就不能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就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即“共产党领导”是国家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

西方舆论将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并将所谓“威权主义”定义为：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结合。尽管在西方甚至中国国内有不少人

是这样理解中国的，但这却远不是事实。中国模式与所谓“威权主义”根本不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并非如专制政治之下以一人、一党、一集团的一己之私为目的之体制，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用以集中资源，统筹安排，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性发展之体制。在中国，权力集中是现象，权力目的是本质。中国集中程度较高的政治权力与政治体制是用于国家的战略性发展，保证中国实现更具效率的集约化发展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民主模式中与保障人民权利同等重要的另一要素。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将民主政治在形式上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式的分类方法。西方一些国家的学术界里，有人针对西方普遍实行的竞争性选举存在的缺陷和导致的问题，提出以审议式民主或民主协商来补充和调适西方政治制度。但这些讨论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思想理论上，议论于非主流学者的沙龙中。在中国则不同，协商民主已经在中国有了长期而广泛的实践，已经成为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

工业化不仅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阶段，也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的时期。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社会大量流动、社会成员身份改变和财富增加，工业化阶段也是社会矛盾大量发生、易于发生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时期。政治体制的选择，对于工业化进程以及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经验证明，在工业化阶段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开放社会参与的权力通道，会导致“分配性参与”，即社会利益群体通过政治活动争取政治权力，通过政治权力改变或影响利益分配的规则和格局。分配性参与的结果是社会的阶级与群体斗争的加剧，通常会导致社会的冲突和动荡。

在工业化阶段重点发展协商民主是中国取得的重要经验。重点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选举民主给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增加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分配性参与”。现阶段发展协商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竞争性民主由于强化分歧和“赢家通吃”效应，容易造成利益排斥。而协

商的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寻求最大“公约数”，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妥协、促进共同利益形成。而这也正是处于工业化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唯一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方法。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多数决定的民主机制也不是截然对立和矛盾的，协商民主可以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通过交流讨论使各种意见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尽可能趋于一致；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其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竞争性民主以及票决民主、选举民主的前提是公开的竞争与辩论，这种民主形式具有自身的优点但也有明显的弱点，这就是分歧与矛盾的公开化。分歧与矛盾的公开化会使具体问题抽象化、原则化，形成价值对立和道德评判，其结果是提高了达成妥协与共识的交易成本。而协商民主是求同存异，在一般情况下回避尖锐矛盾，不公开分歧，结果是有利于妥协和共识的达成，有利于减少妥协的交易成本。

第三，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民主的中国经验首要的部分就包含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但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扩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民权利实现和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发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但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之路并不平坦，许多国家经历了坎坷和曲折，遭遇了“民主失败”。民主的本意是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为什么推行和扩大民主会在一些国家导致混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权利是一种历史现象，权利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的权利观，或认为权利是先验的，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天赋人权”观；还有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的经验本身却完全不能证明人权天赋。美国宪法被看作西方民主的经典，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即确立了人民主权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但直到1865年南北战争后，也就是美国建国近80年后，美国宪法第13至15修正案才规定废除奴隶制和保障黑人权利。又过了近100年到20世纪中叶，美国黑人依然深受种族歧视之害，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实现。1957年“小石城事件”中，美国政府不得不出动101空降师护送黑人小学

生进校上学。直到 60 年代还发生过出动国民警卫队护送黑人乘坐公共汽车的事情。到了 70 年代，因经济发展、社会富裕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多种社会运动高涨，美国的人权才有了较大改善，200 年前美国宪法确定的那些原则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美国政治与社会民主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权利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的确立仅仅是权利的起点而远非终点，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

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从未把权利神圣化、绝对化，从未以先验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的权利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认为，权利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权利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单纯靠政治斗争争取来的，权利在本质上是历史的、相对的。人们只有在具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中国主张要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逐步提高人民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质量。

人民权利需要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宪法和法律确认的首先是一种社会价值准则，是对社会应然状态的肯定，但毕竟法不能规定和产出现实。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法定权利从文本到现实，是一个实践过程。人民的权利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而不是法的产物。因此，中国发展人民权利的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为人民权利的发展创造条件，带动人民权利的扩大和发展。这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依然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经验之一。

第四，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

采取正确的策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中国形成了以问题推动改革和通过试点推进改革的重要经验，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所采取的基本策略。

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浩繁的社会工程。从比较理想的状态设想，民主政治和体制改革应预先进行准备和计划，然后付诸实行。这也被称为“顶层设计”。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在政治建设领域实施顶层设计所需要的条件往往是难以满足的。顶层设计需要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顶层设计的基础是具有足够的同一领域的经验和在一定经验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但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实践对象的重复性低，又不能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人为制造相似环境进行实验。在政治建设领域中进行顶层设计并加以实施，并非完全不可能，历史上亦有先例，如：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法案》，美国独立建国后创制的美国宪政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新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等。这些都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重要的关于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实施，但它们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机遇，这就是社会革命开辟的历史新起点和发展新空间。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往往产生于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年代。而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变动与完善，不是“推倒重来”。改革是继承了原有制度中的众多既定因素，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变革。因此，改革必须面对既有的制度、既定的格局等因素，被束缚于客观的规定性之中，而不能完全按照主观行事。形象地说，革命好似“新区开发”，而改革好似“旧城改造”。与革命时代不同，改革时代的“顶层设计”是罕见和困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策略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即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通过实验分散进行而不是轻易采取“一揽子”方案。所谓从问题出发，是将改革的起点设定于具体问题，从现象入手。现象大于本质。改革从现象入手不会偏离事物本质，而是在尚未认识事物本质的情况下，圈定本质的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改革的尝试，通过部分地解决问题，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

改革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实验、试点，逐步推广。这也是中国改革和民主建设一项重要的、成功的策略。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具有高度的风险和重大责任，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误，后果将十分严重甚至难以补救。当然，改革不可能没有风险，任何改革都必然要面对风险，